

中東歐地方的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 捷克 Oloumoc 及斯洛伐克 Presov 的實證研究¹

鄭得興、張家銘²

一、前言

民主既是憲政機制，亦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中充滿了參與式民主活動的可能性，包含看報、和朋友討論、參與公民團體表達對某種議題的關懷、參與遊行、集會、募款或抵制等活動。參與式民主必須建構在民眾的參與上，低度的公民參與可能導致社會冷漠，而低度公民參與亦可能源自早已存在的社會冷漠。無論如何，低度公民參與對社會整合具有負面影響。與西方老舊民主國家相比，新興民主國家中的政治信任度比較低。依據傳統代議民主制的邏輯，我們將政治上的決策責任和權力交付給政治專家，因為我們相信他們會善用他們的專業能力。然而，這些人經常讓我們失望，原因諸如腐敗、自私、不適任等。如果人民對具有缺陷的政治情況感到無力又無從作為，這就不利於公民社會及民主的發展，傳統的政治參與定義（如投票）應該擴展由公民參與所取代。本文認為公民參與至少應包含以下三個部份：傳統的政治參與（選舉投票）、公民組織的參與（非政府組織 NGOs、非營利組織 NPOs 或第三部門）、及其他政治或社會活動的參與（遊行、集會、募款、抵制、線上論壇等）。

公民參與是公民社會和民主的重要指標，然而公民參與作為評價公民社會與民主的良好指標時，仍需要納入現代公民社會和民主的相關知識。除此之外，公民參與的質量不只以活動的強度來衡量，活動的型態亦很重要，因為兩者都是讓我們了解各種不同的公民社會間各自擁有其不同特質。公民社會不應該被看作是烏托邦或是幾乎不可能達成的目標，公民社會談的不是一個單數，而是一個複合體。公民社會是西方知識體系脈絡下的產物，但是否能套用在非西方社會，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許多非西方的新興民主國家在過去都曾是西方帝國的殖民地，

¹本篇論文曾發表在張家銘教授主持的「中東歐地方社會發展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全球環境下的地方社會發展:捷克、斯洛伐克與台灣個案研究」(2012.6.20)，東吳大學雙溪校區。感謝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洪美蘭教授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²鄭得興，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張家銘，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或在工業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中直接受到西方世界的影響，西方孕育出來的思想近來又轉變為種種不同型態的本土化模式，這樣的情況更加豐富了公民社會的內涵。

整體來說，公民參與的範圍和形式賦予公民社會某些特質，其中歷史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歷史作用是由過去的事件逐漸累積而成，在新興民主國家中通常和前政權有關，它包含了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組成因子。極權或威權政府不會賦予人民全面性政治參與的權力，也不會賦予完整的公民權以籌組公民團體，更遑論進行政治或社會活動的自由。極權與威權政權的治理體制不同，因此隨後的民主化過程也可能各自發展出不同程度與樣貌的公民參與。一般來說，前政權遺緒影響了民主化之後的公民參與範圍及形式。此外，文化的背景，特別是宗教，亦提供了構成公民參與和公民社會形式的參考架構。整體而言，新興民主國家的公民參與比舊民主國家低，其部份因素即來自於前政權遺緒及文化背景的影響，過去的政權使人民對政治動員式的「參與」產生負面觀感。在極權和威權政權統治下，公民養成只管自己的事務就好，他們對其他社會議題漠不關心。這樣的態度和習慣不利於建構現代的公民社會，因為它打擊了公民對公共領域關心的熱情。公民社會從草根性的基層視角鼓勵公民參與，公民參與的本質是開放且公眾性的，是集體社會道德表現的一種形式，因為它所尋求的是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

就新興民主國家而言，健全的憲法體制（包含行政、立法和司法）是必要的民主框架，不過民主機制的實際運轉更富有意義。如果人們把自己的政治權力委託給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後就不再有其他的參與，儘管這樣也是民主的一種形式，然而這樣對提高民主品質並無實質助益。對於前政權所遺留的社會冷漠仍必須循序漸進地採取步驟加以消除，才能讓這些社會逐漸地轉變為參與式民主。參與式民主的功能和代議式民主形成對比，參與式民主要求公民改變對民主政治的態度，不應該只讓所謂的政治專家涉入，而是要讓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公民都能

加入。民眾選舉民意代表以執行民主體制中正式的及立法的功能之外，亦可以參與他們感興趣的公民團體，如關懷弱勢族群、環境、特定議題等。即便是國家決策，除依靠在政府體制內以審慎程序完成外，人們仍可透過一些政治或社會活動，諸如遊行、抵制、集會、網路論壇的方式等來表達對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議題的意見，並增加決策對話的可行性。民主有賴於民眾參與公共事務，而非將自己從公共領域中抽離。對新興民主國家而言，必須賦予公民參與適當的空間，在合法和實質的條件之下去運作，政府也必須有更多的包容以及更少的干預，甚至非法罷工或示威遊行都是新興民主國家對民主寬容的重要試金石。

中東歐後共產國家與台灣都是 Samuel Huntington 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國家，我們過去對中東歐國家的情況較不了解，1989 年中東歐民主化之今已有二十幾年，其中已有十個後共國家加入歐洲聯盟。這些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也早有了新憲法、新制度設計及各種層次的選舉運作，不過這些民主實踐皆須要在一個可靠的公民社會脈絡下才能成熟穩固。因此民主化之後的民主鞏固，其動力來源在於公民社會的建構。本文透過公民社會視角來觀察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發展，然而公民社會的概念又相當廣泛，本文再具體提出公民參與的指標來檢驗中東歐公民社會建構的其中一個面向。另外，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鞏固及公民社會建構初期，前政權遺緒的歷史作用仍可能持續影響人民的政治思維與作為，以西方的理論來解釋新興民主國家前政權遺緒，意指「社會資本」的欠缺，至少包括政治信任、社會信任、政治關懷及社會關懷的程度低，人們普遍對政府貪污腐化不滿，及對政治深感無力等，這些負面要素生成於前政權社會中正符合極權體質所需，因為人們對於獨裁者的逆來順受才能延長其政治壽命。民主化之後，這些負面要素相當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建構，亦即有害於民主鞏固。因此，本文的研究興趣在於探討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的公民參與及社會資本的現況發展，而研究這二者關係之目的在於了解中東歐國家民主化後至今的公民社會及民主發展。

不過，中東歐的範圍過於廣大，每個國家的社會及民主發展情況不盡相同，

本研究首先以宏觀視角將中東歐後共國家視為一整體單位，主要將其與西歐國家比較，檢視歐盟現今東西部的差異。事實上，這項比較研究在本文作者之一的一篇論文中已有初步結果(請參考「中東歐的市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之比較研究」，鄭得興，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08 年春季號)，本文將延續前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一個「大同小異」的視角延伸探討，所謂的「大」是指「中東歐」這個大範圍，意即中東歐相較於西歐舊民主國家，其公民參與的情況是否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或以平均的觀念來說，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的公民參與度是比西歐國家低，不過中東歐內部國家間的差異情形是存在的。所以本文還要從「小」的視角探討中東歐內部的差異，具體而言就是選擇捷克及斯洛伐克的二個中等規模的地方城市做為個案探討。捷克及斯洛伐克曾經共組同一個國家，其政治、社會及經濟體制，乃至語言、文化與民族情感都比中東歐其他國家來得相似與親近，在這樣相似度很高的環境條件下，是否就能導引出相似的公民社會呢？本文試圖從這樣的假設出發：即使像捷克與斯洛伐克這樣背景條件相似的國家，其公民社會發展與實踐結果尚且不同，因此我們很難再將「中東歐」純粹地置放在同一政治脈絡下觀察其民主或公民社會發展。易言之，即單純以中東歐後共產國家民主化的路徑分析來檢驗所謂的後共民主化模式。雖然就整體而言，中東歐民主或公民社會發展的平均比西歐舊民主國家低，但中東歐內部國家間是存有差異性的，甚至有些中東歐國家的政經或民主表現已不下於西歐國家。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探討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發展的異質性。亦即本文認為純粹以「中東歐」的整體視角來理解中東歐可能會越來越不準，本文即以捷克的 Olomouc 城市及斯洛伐克的 Presov 城市這二個各方面條件相似的個案來說明其地方公民參與的差異性，以此來說明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發展的真實情況。

本文的研究架構首先探討幾個與公民社會相關的理論概念，以此建構本研究後續檢驗指標的合理性；其次，延續前述「中東歐的市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之比較研究」的初步成果，以了解中東歐公民參與的「大同小異」之處，並將 Olomouc

與 Presov 置於其比較脈絡中來檢驗地方公民參與的情形；最後，以實證資料檢驗 Olomouc 及 Presov 有關公民參與及社會資本的實際運作及其相關，以進一步了解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的差異情況。在理論概念上，本文亦回顧了 Samuel Huntington 所提出的民主鞏固條件和 Michael Edwards 所提出的公民社會概念。研究工具主要以 ISSP 國際社會調查計畫的公民權（2004-2006）二手資料及張家銘教授 2010 年國科會計畫蒐集到的捷克 Olomouc 及斯洛伐克 Presov 的一手資料。本文為經驗性研究，主要以捷克的 Olomouc 城市及斯洛伐克的 Presov 城市作為個案來檢視其公民社會發展的狀況，並以社會資本的理論概念分析其公民參與的程度及其影響要素。本文除以這二個個案來做為理解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的起點之外，具體的研究問題是試圖求證在許多背景條件十分相似下，Olomouc 及 Presov 的公民參與情況是否相同？歷史作用是否仍為其中的影響因素。由於本文的研究限制而可能無法更深入分析中東歐不同地方公民社會發展的差異性，尤其從歷史作用的角度深入探討地方公民社會的構成。此外，本研究的成果是否能延伸至與台灣之比較？前政權遺緒經常做為解釋中東歐後共國家公民參與率低的因素，台灣的情況也能以歷史作用的脈絡來理解嗎？根據 ISSP 公民權的調查資料(2004-2006)，台灣的公民參與率及社會資本的存有比例普遍也不高，因此從歷史作用途徑來理解台灣，中東歐的經驗可以提供什麼比較的參照呢？雖然這不是本文的探討重點，但值得後續研究。

本文的主要問題意識為隨著中東歐民主化日益鞏固，前共產政權的歷史遺緒是否仍存在後共時期中東歐人民以社會及政治信任為形式的社會資本之中，同時探討中東歐地方社會的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的情形，以做為民主鞏固的參照指標。中東歐 89 年之後的重要社會關懷即是民主化的課題，儘管 90 年代以來制度的改革不餘遺力，畢竟人民的民主意識及實踐才是民主鞏固的關鍵，公民參與度低對深化民主不利，為提高公民參與程度，有必要增進人民對社會及政治事務的關懷，提高社會及政治信任度等，本文在此依據下以檢驗中東歐公民社會的發

展。其中選取捷克及斯洛伐克的二個中等城市做為個案探討，用意在於藉由探索地方公民社會的形成，檢視民主鞏固的縱深，中等城市的人口規模是中東歐國家的主要人口散佈區域，因此本文以二個中等城市為例，有其研究意義與價值。另外，捷克及斯洛伐克儘管過去為一個共同國家，但二國的民族國家發展及社會建設的脈絡仍有諸多差異，因此本文雖然選取二個客觀性質類似的城市(Olomouc 及 Presov)，不過這二座城市所呈現出來的量化意涵仍有諸多比較性，藉由這二座城市的比較可進一步了解二國地方公民社會的異同，同時也呈現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的差異性。本篇論文透過量化研究途徑，藉由捷克 Olomouc 及斯洛伐克 Presov 二座中等城市的個案探討，並以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二項指標，嘗試描繪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的概況，以此總結中東歐民主化及民主鞏固現況。

二、中東歐的公民社會與民主鞏固

許多中東歐的學者、知識份子及政治人物都認為 1989 年中東歐革命的成功是公民社會戰勝共產政權的結果，而公民社會在民主化後更可以防止共產極權的復辟 (Petukhov, 2007:50 ; Ignatieff, 1995:128; Korosenyi, 1994:417; Smolar, 2002:50-52), McSweeney 與 Tempest 則強調推翻共產政權的群眾作用 (McSweeney & Tempest, 1993:408)，這也是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所說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中東歐共產時期的公民社會與群眾共同扮演了對抗共產政權的角色，而革命之後，「公民社會」則從地下對抗形式轉型為正式的運作組織。在革命成功的最初幾年，許多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專家及顧問來到中東歐協助建設當地人民仍不熟悉的西式「公民社會」，他們帶來資金及技術援助，不過由於當地缺少經驗與許多捐助者各有所好，因此「公民社會」整體發展的效果並不佳。大部份的國際捐助者只著重短期計畫，而許多地方組織都只能單純地依賴外國資金與技術 (Jonge, 2006:307-308)。Glenn 認為國際援助在 1990 年代初中東歐的公民社會發展還是起到穩定的作用，同時也影響了經濟的重建與政黨政治的運行 (Glenn,

2000:161-162)。不過，Fagan 則強調主要是中東歐自身的非政府組織在重建公民社會中產生貢獻，而非國際援助(Fagan, 2005:530)。國際援助在中東歐革命成功之初是否發揮重要效果在學者及專家間有不同的看法。

Lovell 指出 1989 年中東歐的革命代表著二種對抗力量的綜合：反蘇與反共，這是一種雙重抗拒的任務。反蘇是基於國族主義的需求，反共則是公民社會的目標。今天中東歐國家仍在克服共產主義遺留下來的負面遺緒，並從中發展公民社會所需的健全制度與態度(Lovell, 1999:65)。共產政權將人們的社會關係原子化及破壞了公民社會的形構，並導致民眾從公領域退回私領域 (Whitefield, 2002:184)。學者 Young 將共產體制比喻為一間公司，其主要目的是要減少交易成本並從生產中獲利，不過由於雇員彼此間的信任基礎薄弱，而導致公司運作不順，老闆可以選擇不幹，不過員工卻不行(Young, 1992:403)。只要群眾一旦了解無法從領導人那裡得到好處，他們對其信任度就會下降，最後他們就會推翻了這個體系。此外，Wnuk-Lipinski 以「族群公民社會」(ethnic civil society)來解釋前蘇聯集團國家民主化的路徑(Wnuk-Lipinski, 2007:30-31)，他強調中東歐國家在 1989 年民主化之後的文化不利因素，不過 Shulman 卻不認同西歐及北美即是公民民族主義，而中東歐則為族群民族主義的這種看法(Shulman, 2002:554)。

Tismaneanu 分析後共時期對自由民主的威脅時表示，不管是在非共國家或是共產國家，都必須考慮歷史遺緒(historical legacy)所扮演的角色，同時必須了解公民社會的重要性。他描述後共轉型的類型為：(A)中歐成功的民主試驗(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及波羅的海國家)；(B)長時間且仍在半路上的轉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克羅埃西亞)；(C)仍具有強烈威權特質的準民主機制，自由仍受政治制度及其他操作因素限制(俄國、烏克蘭、摩爾多瓦、阿爾巴尼亞、白俄羅斯及塞爾維亞)(Tismaneanu, 2002:82-83)。以上三種類型代表對民主的三種態度(A)被鼓勵加入歐盟；(B)仍在奮鬥爭取民主成就；(C)其中有些國家連基本的民主價值都難以獲取。Sadurski 認為中東歐國家在後共時期積極加入歐盟的過程即已

強化了其民主的鞏固(Sadurski, 2004:371)。Dimitrova 及 Pridham 也同意後共產國家加入歐盟的過程導致提升民主的獨特模式(Dimitrova & Pridham, 2004:91)。1989 年中東歐革命證實了公民社會對抗極權政權的功能，同時也呈現出公民社會在非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的不同價值體系。中東歐的公民社會發展豐富了其理論意涵，亦協助後共產國家民主鞏固的進程。

對新興民主國家而言，民主鞏固仍是最大挑戰。Huntington 認為政治體系一旦制度化，民主即能鞏固。他提出「二重翻轉測驗」來測量民主是否鞏固，簡言之，就是政黨至少需要經過二次輪替。Huntington 強調政治行為制度化的重要性，人民對政府政策可以表達不滿，並透過選舉讓執政黨下台。不過，假如民眾對民主體系所累積的失望已超過忍受範圍，又無法更換執政黨，則對民主發展不利。因此，對新興民主國家的人民而言，民主價值與態度的內化相當重要。此外，另一個維繫民主鞏固的條件是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Huntington, 1993:266-271)。Huntington 認為高度工業化、現代化經濟、社會高度發展及教育提升都對民主政權之鞏固有所助益(Huntington, 1993:271-272)，他強調現代性的元素，如經濟、工業化及教育，他也指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過低則不利於民主鞏固，不過印度可能是例外。此外，Huntington 舉了一些相對成功的後威權政權(如西班牙、巴西、台灣、韓國及智利)與不成功的後威權政權(如阿根廷、菲律賓、葡萄牙、玻利維亞、羅馬尼亞)做比較之後，他舉出了新興民主國家鞏固民主的重要意涵，他認為成功的後威權國家（如西班牙），其民主表現亦是如此。不成功的後威權政權（如阿根廷），也很難創造出成功的民主體系（Huntington, 1993:277）。Huntington 雖提及前政權的特質可能影響後政權之民主鞏固，但未再進一步加以驗證。Huntington 也強調制度化政治與民主鞏固的關係，但卻未曾提及公民社會或公民參與在民主鞏固上的角色。因此，Huntington 對民主鞏固的探討仍留有幾個問題必須加以釐清或檢驗，包括(1)在新興民主國家中，前政權遺緒與民主鞏固的關係；以及(2)經濟、政治與教育等因素如何影響民主鞏固。

Myant 與 Smith 認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統治至少留下了三項負面遺緒，第一是正式網絡，共產政權透過該網絡運作其權力結構；第二是共產時期所養成的態度及習性，部分是因為要適應權力所要求的行為，部分是因為要克服匱乏條件下的環境，一般來說，人們普遍缺乏信任感、有意忽視正式規範、依賴個人關係與互利的關係網絡；第三是無意參與公共生活，特別是在 1968 年之後的正常化運動迫使人們退回私人領域裡尋求慰藉(Myant & Smith, 2006:153)。中東歐後共時期的負面遺緒，如社會及政治不信任、社會及政治冷漠、公民組織及行動參與的消極等，仍是公民社會後續發展的隱憂。中東歐國家已陸續加入歐盟，亦向西方公民社會及民主的理念靠攏，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檢視中東歐民主化後這二十幾年來的「公民社會」發展狀況，並藉由「社會資本」及「公民參與」來做為檢驗公民社會發展的指標。

三、公民社會、公民參與及社會資本

(一)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的概念極具爭議性，對那些政治立場中間偏右的人來說，公民社會的使命就是要解構國家的權力，並繼之以基於社會自願性組織而成的中間機構取而代之；然而，對於一些自由派份子而言，公民社會就相當於社會運動，而運動的目的也希望超越國家。公民社會之所以出現於十八世紀那個當下，是為了克服當時公私領域、個人與社會、個人利益與公眾倫理及個人激情與公共關懷間的緊張關係(Seligman, 2002:13-14)。Howard 將公民社會的領域分為公私二部份，私領域是家人與朋友相聚的場合，公領域是不同的人基於共同理念與利益等而成立正式組織，並據此舉辦各種活動。私人領域指涉家庭及朋友關係網絡，公領域可再分為二層，上層包含國家官僚組織與法治，下層則涵蓋政治社會、經濟社會與公民社會。其中，政治社會包括政黨的領導階層、政黨聯盟、職業政治家及政治菁英；經濟社會則由商業及財金機構、企業主與經濟精英組成；公民社會廣泛納入

各種團體、協會、組織、社區及地方性組織，其性質有觀乎人權、和平、環保、教育及文化、宗教、運動與休閒等團體(Howard, 2003:34-35)。公私領域時有衝突，亦有合作，三種社會彼此間亦有重疊之聯結。Peregudov 則指出公民社會為一種政治現象，因為公民社會需要與公共政治互動，而政治社會則作為公民社會與國家的中介機制(Peregudov, 2006:51-52)。

政治社會經常扮演公民社會與國家的中介角色，主要是因為主要政黨不是控制國家機器，就是佔有公民社會中主導性的反對力量。政黨跨足在三種領域之間：國家、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假如公民社會的結社組織只純粹關懷政治性議題，例如環保及人權，他們就需要與國家進行溝通或對抗國家。因此，如果公民社會太過虛弱，則不利於民主機制發展(Petukhov, 2007:50)。公民社會無法脫離政治社會與經濟社會，或甚至遠離國家而獨立存在，相反地，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溝通管道應該是暢通的，不過這不意味著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就毫無緊張性。就某程度而言，公民社會還是站在國家的對立面。

Edwards 反對公民社會的烏托邦定義，他認為公民社會是鑲嵌在不同的文化裡頭(Edwards, 2005:3-5)，他將公民社會分為三種理論類型，分別是公民社會為社團生活、公民社會為良善社會及公民社會為公共領域，他強調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強迫我們接受一種單一及普遍性的公民社會定義(Edwards, 2005:ix)。做為社團生活的公民社會指涉的是第三部門或非營利部門，其中包含介於家庭、國家及自願性活動之間的所有社團組織及網絡，自願性社團為這項分類的典型代表，當中包括各類已註冊的非政府組織、工會、政黨、教堂及其他宗教團體、職業或商業協會、社區及自助團體、社會運動以及獨立媒體(Edwards, 2005:20)。新托克維爾主義者(Neo-Tocquevillians)通常比較強調非營利組織或部門的重要性，並以此做為社團生活的一部分。社團生活的觀點著重公民社會的不同組成成分，以及彼此與公、私機構之間的互動(Edwards,2005:32)。如果將公民社會視為社團生活，則特別強調第三部門或非營利組織的會員身分及其活動。Edwards 將公共領域劃分為

國家、市場及公民社會，其中並無如 Howard 分類中有獨立的政治社會，Edwards 的社會只包括市場與公民社會。另外，第三部門通常是相對於政治與經濟部門，目前該部門的組織已逐漸國際化(A VOLUNTAS Symposium, 2000:103-104)，公民社會的民主導向及國家與社會聯繫的功能也有相當的顯著性(Green, 2002:466)，Rakusanova 則指出公民社會這個詞有點抽象，而且通常也只用於學術或概念意涵的脈絡下，她認為「第三部門」則是比較實用與具體(Rakusanova, 2006:11)。

其次，公民社會為良善社會的基礎在於自由民主的傳統，自由民主的規範價值在於寬容、無歧視、非暴力、信任及合作。由此觀之，公民社會代表著文明的制度化，文明社會中具有高度的信任基礎及合作(Edwards, 2005:38-39)。良善的公民社會是規範性的社會，該社會強調自由與民主的價值。第三，公民社會為公共領域是建構於前二種公民社會定義的基礎之上，公共領域是直接、審議及參與式民主的利益根基，公共審議有賴於流暢的溝通管道，而這些管道不能全盤受制於國家或市場，社團生活與政府公布的法律規範都是公共領域的重要元素(Edwards, 2005:58-59)。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及民主關係密切，而這項關係是透過審議協商過程及集體的公民合作共同創造出來，良善的公民社會追求文明的規範價值，而社團生活的公民社會則在培養公民創造公共領域與良善社會的基礎能力，公民組織的會員資格與公民行動所形構的公民參與內涵是本文理論與操作概念的重點。

(二)公民參與及社會資本

西方傳統的政治理論認為代議民主是政治參與的主要形式，具體而言就是選舉權，合格公民選舉出代議士後，就難以過問政治事務，選民賦權予政治專家或職業政治人物來處理所有的政治、社會及民生等議題。今天儘管選舉功能及政治菁英仍無法由其他機制取代，不過人們已能透過更多的管道參與或監督政府決策。今日，傳統的政治參與範圍雖不斷擴大，卻仍無法滿足人們對公民社會參與的需求，公民參與不僅要求人們參與政治的協商，更希望透過加入公民社團或相

關的政治或社會活動來表達社會關懷，參與民主並不等於某種形式的政治機制，而是擴大範圍使其成為所有生活的方式，並以此相呼應於公民社會的意涵。

Rakusanova 區別公民參與及政治參與的內涵，她認為公民參與可再區分為傳統參與及非傳統參與，傳統參與是加入非政府組織成為其成員，這些組織性質為社會性的、醫療保健、宗教、社區、兒童及青年、運動、婦女或教育等部門；非傳統參與可再進一步區分為合法參與（請願、官方核可的集會或罷工）及非法參與（非法罷工及靜坐）。政治參與則可分成聚集型(agggregated)的參與與個別型(individual)的參與，聚集型的參與包括會員資格及傳統政治組織(工會、職業協會)的參與(包括消極參與，如財政支持)、政黨、新的政治性組織(主要目標為參與決策的非政府組織，如生態及環境團體、和平運動、消費者保護組織、愛護動物、人權、援助開發中國家的組織)。個別型的參與是指參與選舉及公民投票(Rakusanova, 2006:13-14)。在 Rakusanova 對公民與政治參與的分類中，某些公民組織的活動是有重疊性的。不過在公民社會的脈絡之下，公民參與仍有可能取代政治參與，因為公民參與的範圍可涵蓋政治參與，公民參與不僅有政治關懷，也可涉入無政治性目的的文化或宗教生活。

不同於傳統政治參與的間接民主形式，公民參與訴求直接民主。由於現代社會教育水平提升、社會生活的關係連帶網絡緊密及訊息豐富與傳播迅速，人們益發關心其切身利益。近來被熱烈討論與實踐的審議民主或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即呼應了直接民主的訴求，其理論鼓勵民眾參與政策之制定，學者探討審議民主的政治哲學，並具體將之轉化為協商政治的理論，以做為社區發展及問題解決的實務經驗(Elstub, 2007; Norton & Olson, 2007; Tirtanadi, 2006; Rummens, 2006; Goodin & Niemeyer, 2003; Parkinson, 2003; Gutmann & Thompson, 2002; Pettit, 2001; Forst, 2001)。審議民主的內容包括集體決策之制定及相關人員的參與，原則是越是平等的參與，則越是民主，過程是透過深思熟慮及理智辯論，並獲得彼此之信任基礎(Elstub, 2006:303)。審議民主理論描繪出公民社會的樣貌，

其中包括民眾與團體如何與國家產生關係，並如何透過協商政治的方式來扮演溝通或策略性的角色(Hendriks, 2006:487)。不過在社會對話當中，民眾必須培養自身能力，以及獲取相關的資訊(Curtin, 1999:445)。透過社會對話或公共討論，可引起民眾的公共參與，再經由辯論或討論進而取得民眾間的共識(Heysse, 2006:265)，公共討論或公開辯論有助於減少極端化(Stasavage, 2007:59)，Ryfe 在探索審議民主的障礙時表示，一般人民不應只被告知，而應該在決策形成上扮演更積極性的角色(Ryfe, 2005:49-50)。

公民參與需要冷靜與理性，也需要某種熱情來參與公共領域中的政治或社會活動，公民參與在決策規劃與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Ghose, 2005:61)。Kluver 則直指非營利組織就是形成公民參與的培養器(Kluver, 2004:309)。不過也不是所有的學者都同意公民社會或公民參與的全盤功能，Goodhart 質疑公民社會對民主支持的角色，尤其他質疑在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之下，國際組織、跨國組織或全球性機構往往是缺乏民主的(Goodhart, 2005:1-2)。Goodhart 不僅質疑公民社會是否能代表民主，亦質疑全球民主理論的可能性。Hayrinen-Alestalo 則指出新自由主義要求去中央化，並透過競爭來實現效率(Hayrinen-Alestalo, 2001:205)，不過 McLaverty 則質疑公民參與會面臨直接民主與政策效率兩難的問題(McLaverty, 2002:304-305)。儘管公民參與或公民社會對於民主仍有其限制性，不過由於公民參與及公民社會的理念與熱情，仍會持續促進民主鞏固及發展。

公民參與與政治或社會信任或不信任有密切相關，人們對政治或社會的不信任導致人們對公共事務的冷漠。新興民主國家受到前政權遺緒的影響，他們的政治或社會信任度通常都比老牌民主國家低，其人民加入公民社團或參與政治與社會活動意願低落。前面討論的審議民主意即主張在信任的基礎上，進行直接協商的可能性。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重要理論概念，Fukuyama 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非正式的規範，可以促進人際之間的合作，同時社會信任也是一種互利的規範價值，可以做為人際關係往來的潛在資源(Fukuyama, 2001:7)。Fukuyama 將信任、

關係網絡與具有社會資本的公民社會聯繫一起，他強調信任在社團生活的重要性。Putnam 則將社會資本界定為社會組織的特徵，包括信任、規範與社會網絡 (Putnam, 1993:167)。Das 將信任、合作及其他相類似的行為做為社會資本的相關概念，同時再擴充其定義以含納網絡、社團及組織的信任與互利規範，並做為個人的社會資本(Das, 2004:65)。Halman 與 Luijckx 將互利的信任及規範與網絡的參與皆劃歸為社會資本的主要元素(Halman & Luijckx, 2006:70)，Vesely 及 Mares 則界定社會資本為經濟與政治轉型期間社會結構的變遷、社會網絡對個人的重要性、信任、社會和諧、福利國家、社會凝聚、社經發展、公民參與及腐敗等(Vesely & Mares, et al, 2006:10)。Halman 與 Luijckx 認為個人層次的社會資本會促使個人更積極參與建設美好生活，甚至擴展至社區或整個國家(Halman & Luijckx, 2006:65)。Stolle 綜合有關社會資本的不同觀點而認為社會資本並不單獨存在於公民社會的領域中，其他如政府、公共政策、經濟條件與政治制度都會影響社會資本是否成為民主有利或有害的來源(Stolle, 2003:21)。透過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的理論回顧，明顯地看出二者的連結，而社會資本的負面要素恰是中東歐後共國家的前政權遺緒，本文選擇社會/政治信任、關係網絡及社會/政治關懷等社會資本要素做為檢驗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公民參與的現況，目的除了解中東歐後共發展的社會心理狀態外。其次，透過公民參與的實際情況來了解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的公民社會及民主鞏固的質量

四、研究問題、個案分析、研究方法與資料

(一)研究問題

西方公民社會的理論闡述了公民參與及民主的關係，而對公民參與的見解則認為是公民組織及公民行動的參與，事實上民主化前的中東歐社會並未普遍具有這種西方式的公民參與。然而西方學術界仍聲稱中東歐的民主化是由於公民社會戰勝共產政權的結果，這種欠缺公民積極參與的公民社會又如何能推翻共產政權

呢?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相信是「無權力者的權力」發起了絲絨革命，否定了共產政權的正當性，這股力量來自人民及公民社會。共產社會是嚴密控制的政治社會型態，其影響人民對政治及社會的不信任，甚至形成社會冷漠，以致人民對公共領域關心的疏離。本文認為正是這股消極的公民力量推翻共產政權，其中的關鍵正是人民對共產政權的不信任及冷漠疏離所形成的「關鍵力量」。然而民主化之後，人民的不信任與冷漠疏離卻轉成歷史遺緒繼續存在於蛻變後的中東歐「公民社會」裡，本文持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看法，認為中東歐民主化的鞏固需要更多的公民參與，要理解中東歐的公民參與則須從構成社會資本內涵的社會/政治信任、社會/政治關懷及社會網絡等要素談起。本文藉由 2004 年 ISSP 調查資料及 2010 年張家銘教授的國科會研究計畫資料，以實證研究途徑，透過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的理論關係來探討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的現況。本文以捷克的 Oloumoc 及斯洛伐克的 Presov 做為連結理論與現實的分析個案，本文認為負面的社會資本(政治不信任、極小化的社會網絡及社會冷漠)與低度公民參與讓人民與共產極權產生疏離，以致最終被人民唾棄。在共產政權的統治下，公民社會是存在於人民的反共理念中，而不是社會生活普遍的實踐型態。然而共產社會的這些遺緒(負面的社會資本與低度的公民參與)在民主社會中卻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建構，因此也難以鞏固民主化的成果。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於以實證分析了解中東歐地方社會的公民參與，以及檢驗其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之相關性，並以此透視其公民社會及民主發展的現況。

(二)個案分析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中東歐國家是捷克及斯洛伐克，目前這二個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的政經建設發展皆有不錯的進展(二國的基本資料請參考附錄一)，他們過去曾經合組共同國家(1918-1992)，語言、文化及民族性相當類似，同時也是筆者(鄭得興)曾經生活及學習多年的地方(2002-2009)，因此比較有自信掌握當地語

言、歷史及社會發展等脈絡。此外，研究捷克及斯洛伐克亦可作為其他中東歐地區公民社會研究的重要基礎及比較起點。至於選取捷克的 Olomouc 及斯洛伐克的 Presov 二個城市作為地方社會的個案探討，也有一些比較性的考量，首先這二個城市的人口規模相當，大概都在十萬人左右，Olomouc 是捷克的第五大城，Presov 是斯洛伐克的第三大城；其二、這二個城市都處於遠離首都的位置，自古以來就處在有別於首都文化認同圈的範圍之外，Olomouc 位於捷克/摩拉維亞的南部，Presov 位於東斯洛伐克，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的歷史與文化認同；其三，他們都位於第二大城的附近，Olomouc 位於 Brno 的東部，Presov 位於 Kosice 的東部，捷克及斯洛伐克的第二大城是主要的工商業發展重地；其四，Olomouc 及 Presov 都是大學城，Olomouc 有 Palacky 大學，Presov 有 Presov 大學。

就理論而言，公民社會的核心動力來自於由下而上的公民力量，尤其來自地方的草根訴求，以捷克及斯洛伐克為例，除了首都布拉格(人口約百萬)及布拉迪斯拉瓦(人口約四十萬)之外，其他八成左右的人口皆散布在十萬人口以下的城市或鄉村，我們選擇了二座約十萬人口的都市做為地方公民社會的探討，規模再小點的城市或鄉村，其人口分散不均，而導致其公民參與的組織將更形不易，這除了是地方公民社會的限制之外，也會成為我們田野研究上的障礙。地方公民社會發展的程度正能檢視一國公民社會發展的整體水平，而不能僅僅觀察首都或較大城市公民社會發展情形。來自較遠離首都、規模較小的及甚至是地方認同感強烈的城市或地區，正能觀察由下而上的公民自主力量，所以我們選擇了捷克的 Olomouc 及斯洛伐克的 Presov。其次，從個案本身的特質來看，這須再分從二個層面來說明。第一，捷克及斯洛伐克公民社會的發展是置於後共產國家的民主鞏固脈絡下來審視，與其他後共產國家的發展路徑仍有相似之處，包括民主化的時點、民主鞏固的歷程及加入北約及歐盟的目標等，在這發展路徑過程中，這些後共國家的公民社會可以相互參照與比較，因此捷克及斯洛伐克可以合理成為本研究取樣的中東歐國家樣本。第二，Olomouc 及 Presov 是中東歐的歷史城市、宗教

城市及大學城市，是捷克及斯洛伐克的重要文化資產城市，他們有強烈的地方認同意識。在過去歐洲封建制度盛行的年代裡，城市或鄉村所遺留至今最重要的歷史遺產就是這種地方文化風貌，人民附著於土地，社會網絡的情感作用來自於草根的地方感。因此本文選擇 Olomouc 及 Presov 多少正反映了捷克及斯洛伐克，甚至是中東歐地方社會的現實，亦即地方的文化認同屬於同一片土地共同生活的情感連帶，這樣的社會連帶相較於首都或較大城市的巨大社會網絡，人們的距離是比較親近的，因此本文認為 Olomouc 及 Presov 可做為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或捷克及斯洛伐克）的某種縮影。

本文以捷克 Olomouc 及斯洛伐克 Presov 做為個案分析，恰好反映上述二個層面的比較可能性：捷克及斯洛伐克可做為中東歐公民社會的考察窗口，以及 Olomouc 及 Presov 做為捷克及斯洛伐克地方公民社會的認識基礎。從後共社會大環境來看，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公民社會發展與民主鞏固路徑是同方向的，Olomouc 及 Presov 各方面的條件也相當，所以當我們以公民參與來檢驗捷克及斯洛伐克地方公民社會發展時，我們想檢驗這二座城市的公民參與是否相當？不過，以後共國家民主化過程的路徑分析來檢視中東歐公民社會的發展，亦可能會掩蓋後共國家間彼此的差異。易言之，中東歐後共國家公民社會的真實情況仍存有千差萬別的，尤其這二十幾年來的政經發展與民主鞏固的關係。綜合上述，一則因為後共大環境的變遷、二則因為中東歐地方社會的歷史、文化、社會網絡及地方認同等因素，本文選取捷克 Olomouc 及斯洛伐克 Presov 做為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的個案分析。本文的研究分析途徑首先從宏觀驗證再進入到微觀檢視，中東歐做為後共國家區域仍有其民主化路徑上的相似處，但我們也發現中東歐國家間彼此的差異性，因此繼之以二個地方個案做為實證檢驗，在上述諸多相似條件背景下，我們想了解 Olomouc 及 Presov 是否有相似的公民社會發展結果。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

本研究主要利用二筆不同的資料集，進行實證研究。其一是 2004 年國際社會調查資料的資料集(ISSP 2004，公民權專題)，該筆調查資料的執行調查期限為 2004-2006 年，其資料來源為 ZACAT 網站的出版資料(<http://zacat.geisis.org/webview/index.jsp>)；其二是張家銘教授的國科會計畫資料(「轉型與全球化中的地方社會發展：捷克與斯洛伐克個案的社會學研究」，2009)。前者資料作為本文對中東歐、捷克及斯洛伐克、Olomouc 及 Presov 的宏觀檢視，後者以 Olomouc 及 Presov 做為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的個案分析。相對而言，中東歐做為一個區域理解，其文獻資料及相關資訊較多。但針對中東歐內部，尤其是地方社會而言，我們幾乎無從了解。我們在認知中東歐及台灣作為新興民主國家發展的脈絡下，彼此應該有許多參照經驗可供分享。因此，張家銘教授組織了研究團隊進入中東歐地方社會進行田野調查，以蒐集第一手資料，我在 2009 年從捷克學成歸國之際，擔任張教授的博士後研究。

中東歐地方社會(Olomouc 及 Presov)的研究工具包括社區居民態度的量化問卷調查及公民組織領導人的質性訪談。首先，我們先設計出一份研究架構圖，再根據研究架構中的評估指標設計一份英文問卷，總計 69 道題目。接著我們邀請捷克及斯洛伐克學者及專家為我們進行問卷的專業評估，並將之翻譯成捷克文及斯洛伐克文版的調查問卷。最後，我們將翻譯好的問卷請在台灣留學的捷克及斯洛伐克學生進行試測，並根據試測的結果及其意見進行最後修訂及定稿。另外，我們再根據研究架構的評估指標設計一份二十幾道题目的深度訪談問卷，同時請我們的捷克及斯洛伐克合作學者為我們尋覓及聯繫適當的地方社團組織，以供我們前往訪談及參觀。最後我們順利蒐集到 21 份的深度訪談資料，以及 Olomouc 及 Presov 各 335 份的問卷調查資料，本文分析僅以問卷調查資料做為實證研究依據。

在本文中，公民參與的操作型定義不包括選舉或公投，而是指涉更廣泛的政治與社會活動，如參與公民社團成為其會員，或其他的政治或社會活動方式：示

威遊行、政治集會、抵制行動、論壇，及向媒體或政治人物表達看法。越具有合法性與健全的公民參與，越容易提升公民社會與民主的質量，不過有時候若干極端運動亦能測量民主的寬容度，他們亦可能對民主價值產生質疑，並付出相當的社會成本與效率。另外，政黨及公民組織參與的指標有五個變項，公民組織包括工會、工商業公會、職業同業公會；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其他自願性團體。每個問題(變項)的選項包括(1)有加入而且積極參與；(2)有加入但不積極參與；(3)過去加入但現在已經不是；(4)從未加入過該團體。本文選取(1)及(2)選項做為有參與政黨或其他公民組織，但並不分析加入後積極參與的程度。公民行動的變項有八個，分別是請願連署、為某個社會或政治活動捐錢或募款、向媒體表達意見、參加示威遊行、參與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向政治人物或公務人員表達意見、為某個社會或政治活動捐錢或募款、參加示威遊行、向媒體表達意見、加入網路的政治論壇或討論群組。每道問題(變項)有 4 個選項：(1)去年 1 年中有做過；(2)更早以前有做過；(3)過去沒作過，將來可能會做；(4)過去沒做過，將來也不會做。本文選取(1)及(2)做為有參與公民行動的事實。本文第一部分的宏觀比較主要針對西歐與中東歐二部份，主要是因為歐盟已經東擴至中東歐地區，而歐盟在中東歐民主化進程中影響甚深。因此，中東歐民主化後的參照對象主要是以西歐地區為主。

五、實證分析與討論

本節的實證分析架構包括二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比較中東歐與西歐在公民參與上的差別，公民參與的具體指標包括公民組織及公民行動的參與。這部份是延續筆者(鄭得興)在「中東歐的市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之比較研究」論文中的研究成果，從中東歐整體平均及內部差異來延伸討論為何僅視中東歐為一整體之不足。第二部份則以捷克的 Olomouc 城市及斯洛伐克的 Presov 城市作為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異質性的探討。

(一)中東歐與西歐公民參與之比較

上世紀八零年代末蘇聯及東歐發生了巨大變化，民主化的東歐國家轉向尋求西歐價值的認同，2004 年首先有八個前共產國家加入了歐洲聯盟，2007 年再加上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目前已有十個前共產國家成為歐盟的會員國，就數目而言，已超過歐盟會員國總數(27 國)的三分之一。歐盟東擴是歐洲整合的重要方向，東歐前共產國家必須符合西歐的民主價值才能被接納成為歐盟會員國。東西歐雙方的民主價值差距主要表現在於西方民主是實踐在社會生活之中的公民參與，而中東歐前共產國家的公民參與率就整體來說仍然比較低。表 1 至表 4 比較了中東歐國家與西歐國家在公民參與的整體情形，不過我們也可看出個別國家的差異。本文選了 11 個西歐國家，及 8 個中東歐國家，也就是後共產國家(德東在本文中亦算一個檢驗的樣本)做為實證比較的兩個組別。本研究將公民參與分為二部份，其一為公民組織的參與，其二為公民行動。首先從公民組織的參與來看(表 1 及表 2)，中東歐國家與西歐國家有顯著的差異，雙方在政黨、工會及工商同業公會或職業同業公會、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及其他自願性社團等公民組織的參與率上有明顯的落差，中東歐國家的平均水平遠低於西歐國家的參與水準。不過就個別國家來看，捷克及斯洛伐克絕大部分的情形也是低於西歐國家的水準，在中東歐國家內部捷克在政黨、運動及文化、以及其他自願性團體的參與率都比中東歐國家平均水平高，斯洛伐克則只有在政黨及其他自願性社團的參與率高於中東歐平均水平。捷克與斯洛伐克曾為同一個國家，從二國的各項公民組織參與率來看似乎是差不多的情形。另外，以本研究所選取的兩個城市來觀察，捷克的 Olomouc 除了在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一項的參與較低外，其他的公民組織參與皆高於中東歐國家的平均水平。而斯洛伐克的 Presov 則除了政黨一項外，其他各項公民組織參與率皆高於中東歐的平均水準。就置放在捷克及斯洛伐克國內的脈絡下觀察，Olomouc 及 Presov 分別有些項目高於全國平均水

平，然而有些項目呈現參與率較低的情形，並未普遍高於或低於全國平均參與率。另外，再就 Olomouc 與 Presov 二座城市相比，Olomouc 除了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的參與率低於 Presov，其他四項的公民組織參與皆高於 Presov，而且雙方的差距似乎不小，本文稍後會再討論 Olomouc 即 Presov 的公民參與情形。

表 1 政黨及公民組織的參與(西歐 VS. 中東歐) 2004-2006 (%)

	政黨	工會、工商同 業公會或職 業同業公會	教會或其他宗 教團體	運動、休閒或 文化團體	其他自願性 社團
西歐國家					
德西	4.0	17.0	64.3	38.4	14.1
英國	10.9	20.3	34.2	28.2	17.1
奧地利	17.9	37.1	70.2	42.5	25.3
荷蘭	11.3	30.5	40.3	56.2	25.5
瑞典	9.9	64.2	60.5	50.0	24.3
法國	4.9	20.4	22.8	43.8	34.1
瑞士	9.0	26.2	60.5	43.2	23.8
丹麥	7.4	69.1	84.8	52.3	42.0
挪威	17.2	52.6	58.0	44.0	38.1
芬蘭	9.5	55.9	68.2	39.7	36.0
愛爾蘭	10.2	28.7	75.6	44.6	27.4
(平均)	(10.2)	(38.4)	(58.1)	(43.9)	(28.0)
中東歐後共產國家(或地區)					
匈牙利	1.5	10.5	30.2	7.4	4.1
德東	5.3	17.5	23.6	27.1	8.4
捷克	8.2	11.2	19.7	20.6	13.4
斯洛文尼亞	5.4	25.5	34.8	35.1	20.8
波蘭	0.7	7.7	64.0	8.6	4.6
保加利亞	6.4	11.8	4.0	3.6	1.7
拉脫維亞	2.0	13.9	34.6	19.4	10.3
斯洛伐克	6.8	12.8	23.6	15.3	14.3
(平均)	(4.5)	(13.9)	(29.3)	(17.1)	(9.7)
Olomouc	5.5	21.1	8.1	30.0	16.5
Presov	3.1	14.7	42.1	19.8	11.3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2004: Citizenship (ISSP 2004)及 2009 年張家銘教授國科會計畫(轉型與全球化中的地方社會發展：捷克與斯洛伐克個案的社會學研究」，2009)的調查資料。

總結公民組織參與的情形，第一、儘管民主化已有十數年之久，就公民組織參與的情形而言，中東歐仍遠落後於西歐。第二、就整體平均來看，雖然中東歐的公民組織參與率遠低於西歐，不代表中東歐國家內部的公民組織參與率具有一致性，實際上中東歐國家內部的變異情況不小。第三、捷克及斯洛伐克曾為同一國家，結果其公民組織的參與情形似乎相當，同為遠低於西歐的參與水平，在中

東歐內部的公民組織參與情形皆在中下層次。第四、以捷克 Olomouc 及斯洛伐克 Presov 二座條件相當的中等規模城市相比，他們在公民組織的參與情況普遍皆高於中東歐的整體水平，但皆未普遍高於或低於國內平均水平。如以二座城市相比，Olomouc 的公民組織參與情況普遍高於 Presov。

表 2 政黨及公民組織參與的差異性檢定

	西歐 平均數%(標準差) (n=11)	中東歐 平均數%(標準差) (n=8)	平均差異 檢定
政黨	10.2(4.3)	4.5(2.8)	3.243*
工會、商業或職業團體	38.4(18.8)	13.9(5.5)	4.091*
教會或宗教團體	58.1(18.6)	29.3(17.2)	3.444*
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	43.9(7.5)	17.1(10.6)	6.104**
其他自願性社團	28.0(8.7)	9.7(6.3)	5.296**

t 檢定 *p<0.01 **p<0.001

本研究第二個公民參與的指標為公民行動，包括八個觀察變項，分別是請願連署、杯葛或刻意採購特定產品、參加示威遊行、參與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向政治人物或公務人員表達意見、為社會或政治活動募款或籌設基金、向媒體表達意見、以及加入網絡的政治論壇或討論群組等，表 3 及表 4 為西歐國家與中東歐國家在上述八項公民行動的參與及差異比較情形。首先透過表 3 的資料可以發現中東歐在所有項目的公民行動參與率上都低於西歐，繼續以表 4 的差異性檢定來看，其中有高達五項具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就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公民行動而言，捷克在八項公民行動中皆低於西歐國家的平均水平，斯洛伐克除參與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之外，其他七項低於西歐國家。另外將捷克及斯洛伐克放在中東歐區域內部觀察，捷克有四項高於中東歐平均水平，另外四項則低於中東歐平均水平，而斯洛伐克則全數高於中東歐的平均水平。如以捷克與斯洛伐克二國相比，除了杯葛或刻意採購特定產品一項公民行動之外，斯洛伐克在其他七項的公民行動參與率皆高於捷克。最後再觀察 Olomouc 及 Presov 二座城市的公民行動參與，整體來看，他們的公民行動參與情形並不下於西歐水準，比如請願連署、示威遊行、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Presov)、以及向媒體表達意見等公民行動項目的參與率皆高於西歐平均數。同時這二座位於捷克及斯洛伐克的中等規模城市，其公民行動的參與率皆高於中東歐的平均水準。致於 Olomouc 及 Presov 在公民行動的相

互比較，雙方各在一些項目的參與率上領先。總結西歐與中東歐公民行動的參與情形如下：第一、整體來說，中東歐在公民行動的參與仍與西歐有段差距。第二、中東歐在公民行動參與上的內部變異情況高於西歐國家(表 4)，這表示不能將中東歐視為同質性高的整體。第三、捷克及斯洛伐克在公民行動的參與上普遍低於西歐，捷克在中東歐公民行動的比較脈絡下約在中間位置，斯洛伐克普遍高於中東歐的公民行動參與水平。第四、Olomouc 與 Presov 的公民行動參與率不下於西歐，且皆高於中東歐水平，以及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國家水平。二座城市的公民行動參與情況似乎相當。

綜合以上公民參與的實證檢驗，有幾點研究發現：第一、在中東歐民主化的十數年後，中東歐的公民參與仍遠低於西歐的水平；第二、儘管中東歐整體平均水平遠低於西歐，但中東歐內部變異情況大，因此不能簡單地將中東歐視為一體看待，應注意內部差異；第三、捷克及斯洛伐克曾為同一個國家，除了公民組織參與情形相當外，斯洛伐克在公民行動參與率上普遍高於捷克。這點特別有趣，斯洛伐克在 1970 年代以後的正常化運動，共產政權在斯洛伐克大力推展工業建設，以致社會生產力有所提升，並讓民主化後的前共產黨繼續在斯洛伐克執政，也由於前共產政權的延續而讓斯洛伐克在加入北約的進程上比捷克晚了幾年，還差點無法在 2004 年加入歐盟。民主化後的捷克在政治及經濟變革的成就上，應該是高於斯洛伐克，但為何實證結果是斯洛伐克的公民參與率（或公民行動參與率）高於捷克呢？這可做為另項研究；第四、二座中等規模的捷克 Olomouc 及斯洛伐克 Presov 城市，公民參與率皆高於中東歐的平均水準，同時僅就公民行動的參與而言，亦與西歐水平不相上下。中等規模城市是否更有效率組織公民參與，形塑地方公民社會，並形成堅實的草根民主，也是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無法全面針對研究發現而即時提出一套周延的解釋，但在研究過程中所發現的結果都可作為後續研究的起點。在上述研究發現中，中東歐整體的公民參與仍遠低於西歐，但就個別國家而言，雖然國家間有差異情況存在，但普遍還是低於西歐的公民參與率，惟有從中東歐地方城市來看，以捷克 Olomouc 及斯洛伐克 Presov 的公民參與（尤其是公民行動）為例，已經高於中東歐平均水平，甚至部分指標與西歐不相上下。研究中東歐地方的中等規模城市或許對於公民社會及民主化會具有啟發性的發現，這點需要更多的論證，在此暫且不論，下文將繼續更深入探討 Olomouc 及 Presov 的公民參與情形。

表 3 公民行動，(西歐 VS. 中東歐) 2004-2006 (%)

	請願連署	杯葛或刻意採購特 定產品	參加示威遊行	參與政治集會 或造勢活動
西歐國家				
德西	53.1	42.1	25.7	32.6
英國	73.7	40.1	14.4	15.6
奧地利	69.2	56.9	21.9	35.9
荷蘭	69.7	42.9	28.9	26.0
瑞典	77.1	54.5	27.3	28.3
法國	76.3	49.3	45.4	38.2
瑞士	59.1	55.1	17.3	30.7
丹麥	69.5	54.0	29.9	40.5
挪威	66.6	48.5	25.6	28.3
芬蘭	49.0	45.7	14.0	30.6
愛爾蘭	55.3	30.0	24.9	23.8
(平均)	(65.3)	(47.2)	(25.0)	(30.0)
中東歐後共產國家(或地區)				
匈牙利	15.7	5.1	5.1	10.0
德東	60.7	37.9	44.7	42.7
捷克	33.4	14.5	20.7	21.2
斯洛文尼亞	33.4	13.9	17.1	19.5
波蘭	13.0	5.1	5.0	5.8
保加利亞	10.0	3.2	14.2	27.4
拉脫維亞	18.1	9.4	32.5	28.3
斯洛伐克	57.8	14.1	22.7	38.3
(平均)	(30.3)	(12.9)	(20.3)	(24.2)
Olomouc	70.6	34.5	46.9	25.0
Presov	84.6	21.3	28.7	36.4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2004: Citizenship (ISSP 2004)及 2009 年張家銘教授國科會計畫(轉型與全球化中的地方社會發展：捷克與斯洛伐克個案的社會學研究」, 2009)的調查資料。

表 3 續前表

	向政治人物 或公務人員 表達意見	為社會或政治 活動募款或籌 設基金	向媒體表達意 見	加入網路的政 治論壇或討論 群組
西歐國家				
德西	21.8	68.7	13.3	3.1
英國	24.4	31.4	9.7	2.8
奧地利	34.8	76.3	18.9	5.2
荷蘭	24.0	63.5	26.1	8.1
瑞典	18.9	43.5	12.2	4.9
法國	22.7	47.8	14.4	6.2
瑞士	20.3	70.2	12.6	3.8
丹麥	24.7	62.5	15.4	4.7
挪威	23.9	56.2	17.6	4.8
芬蘭	24.8	40.8	20.2	4.6
愛爾蘭	35.8	43.4	7.6	2.7
(平均)	(25.1)	(54.9)	(15.3)	(4.6)
中東歐後共產國家(或地區)				
匈牙利	6.1	8.5	3.7	2.2
德東	17.3	65.1	13.2	3.9
捷克	9.7	21.7	4.8	3.7
斯洛文尼亞	12.9	23.2	8.8	5.5
波蘭	4.6	21.6	2.9	4.7
保加利亞	8.0	22.4	4.0	1.5
拉脫維亞	17.1	34.9	8.3	7.1
斯洛伐克	16.9	29.0	12.8	4.2
(平均)	(11.6)	(28.3)	(7.3)	(4.1)
Olomouc	22.2	43.8	16.2	--
Presov	21.5	34.1	16.6	--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2004: Citizenship (ISSP 2004)及
2009 年張家銘教授國科會計畫(轉型與全球化中的地方社會發展：捷克與斯洛伐克個
案的社會學研究」, 2009)的調查資料。

表 4 公民行動的差異性檢定

	西歐 平均數%(標準 差) (n=11)	中東歐 平均數%(標準 差) (n=8)	平均差異 檢定
請願連署	65.3(9.7)	30.3(19.9)	4.603*
杯葛或刻意採購特定產品	47.2(8.1)	12.9(11.1)	7.822**
參加示威遊行	25.0(8.7)	20.3(13.4)	.942
參與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	30.0(7.0)	24.2(12.8)	1.297
向政治人物或公務人員表達意見	25.1(5.4)	11.6(5.4)	5.487**
為社會或政治活動募款或籌設基金	54.9(14.4)	28.3(16.6)	3.728*
向媒體表達意見	15.3(5.2)	7.3(5.2)	3.581*
加入網路的政治論壇或討論群組	4.6(1.6)	4.1(1.8)	.683

t 檢定, *p<0.01 **P<0.001

(二)地方社會發展

1989 年民主化之前的共產政權與之後的民主政權，其社會生活型態有巨大的差異，但這種轉型的差異在 2004 年加入歐盟之後又是一轉折，中東歐國家在加入歐盟之前的公民投票時，都一致表達了加入歐盟是爲了美好的明天，也是爲了下一代的美好。本研究所採用的調查資料是來自張家銘教授國科會計畫，我們在 2010 年一起前往捷克及斯洛伐克進行田野調查，以下表格所呈現的就是當時在 Olomouc 及 Presov 的調查結果。我們的問題都設定在 2010 年與加入歐盟(2004 年)的時點做比較。自本小節以下將比較捷克的 Olomouc 城市與斯洛伐克的 Presov 城市，我們目的是要透過地方城市的社會發展、公民參與及社會資本情形，來探究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發展的梗概。首先，就整體生活條件來說，Olomouc 的居民認爲加入歐盟之後的整體生活條件變好的有 3 成 7，認爲沒什麼變的也有 3 成 7。相較於 Olomouc，Presov 的居民則有高達 5 成 2 左右認爲整體生活條件變好。經過差異性檢定的結果，Olomouc 及 Presov 二座城市的居民認爲整體生活條件有變化的情形呈顯著差異。但假如再細問更多的問題，我們會發現情況未必如此樂觀。我們接著問了二大指標性的問題，其一是工作條件相較過去，有無好轉？其二是受訪者對當下的生活環境是否滿意？就工作條件而言，包括四個問題。第一、收入有變好嗎？Olomouc 的受訪者回答沒有改變的比例（42.4%）比變好的比例還要高（36.7%），相反地，Presov 的受訪者有 4 成 4 回答收入有增加，不過也有接近 3 成 3 的受訪者回答沒變。其次，就工時、工作安全及工作福利三者而言，回答的情況顯得較爲悲觀，以工時而言，二座城市的受訪者大都認爲跟以前一樣，沒什麼變化。不過就工作安全來說，現在的情況顯然很糟，二座城市都超過一半的比例回答工作安全比過去不好。另外，儘管已加入了歐盟，人們期待生活條件應該要比從前好，但從最具體的工作福利來看，二地都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回答沒變，尤有甚者，Presov 有 3 成 3 的受訪者竟回答變的更壞，就工作福利

而言，Olomouc 與 Presov 受訪者的感受有明顯不同，其中，Presov 受訪者的感覺比較不好。

表 5 工作條件之卡方檢定

	Olomouc +/0/-(%)a	Presov +/0/-(%)	卡方差異檢定 Chi square value
整體生活條件	37.3/37.0/25.6	51.5/30.7/17.8	14.143**
工作條件-收入	36.7/42.4/20.9	44.2/32.8/23.0	6.461
工作條件-工時	16.1/54.3/29.6	17.1/46.8/36.1	3.881
工作條件-工作安全	11.1/34.6/54.3	8.8/31.8/59.4	1.968
工作條件-工作福利	19.4/59.9/20.7	15.8/51.0/33.2	11.856*

*p<0.01, **p<0.001

a:+:更好或好, 0:沒有明顯不同, -:壞或更壞

表 6 生活環境之卡方檢定

	Olomouc -/0/+(%)	Presov -/0/+(%)	卡方差異檢定 Chi square value
經濟生活差距	52.1/34.7/13.2a	43.8/25.8/30.3	28.776**
生活環境-基礎建設	22.4/46.6/31.0b	47.9/39.4/12.6	55.608**
生活環境-社會照護	28.4/37.4/34.2	45.2/45.2/9.6	57.746**
生活環境-醫療照顧	30.0/31.6/38.4	57.4/27.4/15.2	61.671**
生活環境-教育	31.1/37.1/31.8	39.4/43.2/17.5	17.629**
共產時期之懷舊	11.6/14.8/73.6c	19.3/31.1/49.5	38.906**

*p<0.01, **p<0.001

a:-:加大差距, 0:沒有明顯不同, +:縮減差距

b:-:需要更好, 0:稍微再好, +:已經滿足

c:+強烈同意或同意, 0:無所謂, -不同意或強烈不同意

儘管 Olomouc 與 Presov 的受訪者大都認為整體生活條件比加入歐盟之前要來得好，不過付出的代價是經濟生活的差距變得更為嚴重，Olomouc 有 5 成 2 的受訪者認為差距加大了，Presov 則有 4 成 3 的受訪者如此想，二地受訪者認為生活差距惡化的比例占多數。接著從不同的生活環境條件來詢問受訪者的滿意度，顯然地 Presov 的受訪者在所有問題的不滿意度上皆顯著地高於 Olomouc 的受訪者，包括基礎建設、社會照護、醫療照顧及教育等。在基礎建設上，Olomouc 的受訪者只有 2 成 2 的受訪者認為需要更好，不過也有 3 成 3 的受訪者表示已經滿足。反觀 Presov 的受訪者，將近 4 成 8 的受訪者很不滿意，而僅有 1 成 2 的受訪

者肯定目前的基礎建設。Presov 的受訪者亦對社會照護、醫療照顧及教育三項生活環境表達相當不滿，其滿意度都在一成多，社會照護更低於一成。Olomouc 大都有 3 成多的受訪者表達對各項生活環境條件的滿意，不過也有 2 成 2 到 3 成 1 不等的受訪者表示相當不滿。然而在工作條件及生活環境條件的諸多抱怨下，Olomouc 及 Presov 的受訪者大都不同意對共產政權抱持著懷舊的心態，其中 Olomouc 的受訪者更高達 7 成 3 的比例不同意對共產政權懷舊，Presov 也有將近五成的比例不認同共產政權。

綜合上述的結果，有幾點發現如下：第一、加入歐盟之後，Presov 的居民認為整體生活條件比從前好，Olomouc 的居民比較持保守的看法；第二、從工作條件與生活環境條件二大指標來看，Presov 的居民普遍較為不滿，此與前述認為整體生活條件比從前好的感覺似乎矛盾。Olomouc 的受訪者在生活環境條件的滿意度上普遍高於 Presov。第三、大致而言，Olomouc 與 Presov 的受訪者大都不認同對共產政權的懷舊，不過 Olomouc 的不認同度又明顯高於 Presov。第四、整體來看，Olomouc 的居民對於近幾年地方社會發展的滿意度似乎高於 Presov 的居民。過去共產政權的人民生活基本上並不富裕，許多政治與社會參與都是動員的結果。民主化之後的社會參與是人民自由意志的結果，但事實上卻仍受限於社會生活的發展，易言之，社會發展落後不太可能激發公民參與的熱誠。從工作條件及生活環境條件不滿意度的反面檢視看 Olomouc 及 Presov 居民對地方社會發展的態度，顯然地 Olomouc 的居民比 Presov 的居民更為滿意些。在共產時期，斯洛伐克的社會發展落後於捷克，但民主化之後，尤其近年來斯洛伐克的社會發展有明顯的進展，除了 2004 年加入歐盟之外，2007 年加入申根條約，2009 年加入歐元區，因此 Presov 的居民可能普遍感到整體生活條件比以前好。不過具體地問到工作條件及生活環境條件時，以及同時與 Olomouc 的居民相比，Presov 的居民覺得有待改進之處仍然甚多。前述資料顯示 Olomouc 與 Presov 的公民參與情形，明顯地高於中東歐的平均水平，這與本節所理解的地方社會發展應該具有正面的相關性。

易言之，地方社會發展帶動地方的公民參與。以下將檢驗 Olomouc 與 Presov 公民參與的情形，藉之更深入了解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發展的情形。

(三)地方公民參與

本文將公民參與指標化爲公民組織的參與及公民行動參與二種，其中公民組織的參與包括政黨等五項，公民行動的參與包括請願連署等七項(表 7 及表 8)，本小節實證觀察的重點有二，其一爲檢驗 Olomouc 及 Presov 在十一項公民參與指標中差異的情形；其二爲觀察 Olomouc 及 Presov 的公民參與特色。首先，就公民組織的參與而言，Olomouc 只有在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一項中的比例低於 Presov，其他四項的比例皆高於 Presov，其中又僅有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一項的差異達顯著水準。雖然 Olomouc 在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的參與比例仍低於西歐水平，不過在中東歐國家裡算是高參與的，我們在 Olomouc 進行公民組織深度訪談期間，捷克的合作學者就特別安排五處運動、休閒及文化團體，其中包括二個與 Sokol 有關係的運動及文化組織，其他爲童子軍組織、青年電影文化社團及青年劇院等，占了我們參訪比例的一半。Sokol 運動文化組織起緣於捷克 19 世紀中的民族復興運動，目的是要健身救國，之後該組織散佈世界各地，其中 Olomouc 即爲捷克 Sokol 的地方中心。Presov 城市的最主要特色在於宗教，該城號稱爲五大宗教的地方中心，因此比起 Olomouc 的宗教參與情況(8.1%)，Presov 明顯高出甚多(42.1%)。相較於 Olomouc 的運動、休閒及文化團體的特色，Presov 則爲一宗教色彩濃厚的地方城市。此外，相較於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全國平均水準，Olomouc 及 Presov 的政黨參與率皆較低。最後，其他自願性團體就是本研究中特別指涉的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Olomouc 這方面公民組織的參與比例不僅高於 Presov，同時也高於捷克的全國平均，而 Presov 是低於斯洛伐克的全國平均，但是高於中東歐整體平均。

其次，就公民行動的參與而言，本小節選取七項指標來觀察，在這些指標中

並沒有其中一座城市的參與率一面倒勝過另一座城市的情形。首先，就請願連署一項來看，儘管 Presov 的比例(84.6%)顯著高過 Olomouc(70.6%)，但二者實際上皆已高於西歐的平均水平，這種請願連署的公民參與方式可謂是這二座地方城市最大的特色。總體來看，Olomouc 在杯葛或刻意採購特定產品、參加示威遊行、向政治人物或公務人員表達意見及為活動募款或籌設基金等四個項目的參與比例高過 Presov，而另外三項則是 Presov 高於 Olomouc。從這些公民行動的實證結果除了請願連署一項外，其餘的情況很難歸納出二座地方城市的個別特色。不過就整體視角來觀察，ISSP 的調查資料分別是 2004 年至 2006 年期間完成蒐集，而 Olomouc 及 Presov 的資料是在 2010 年進行，期間相差大概五、六年，其中或許有二種可能性來解釋 Olomouc 及 Presov 的地方公民參與為何普遍高於全國平均，或甚至接近西歐水平。其一，是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的效應，其二是中等規模地方城市的公民參與特色，或者二者有相乘效果。不過，至少與中東歐整體水平相比，或與捷克及斯洛伐克全國相比，Olomouc 及 Presov 的公民參與比例是高於前者的，這是在我們研究預期之外的發現。

表 7 政黨及公民組織參與之卡方檢定

	Olomouc 有/無 (%)	Presov 有/無 (%)	卡方差異檢定 Chi square value
政黨	5.5/94.5	3.1/96.9	2.262
工會、商業或職業同業公會	21.1/78.9	14.7/85.3	4.600
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	8.1/91.9	42.1/57.9	98.209**
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	30.0/70.0	19.8/80.2	9.087*
其他自願性團體	16.5/83.5	11.3/88.7	3.569

*p<0.01, **p<0.001

表 8 公民行動之卡方檢定

	Olomouc 有/無 (%)	Presov 有/無 (%)	卡方差異檢定 Chi square
請願連署	70.6/29.4	84.6/15.4	18.812**
杯葛或刻意採購特定產品	34.5/65.5	21.3/78.7	13.681**
參加示威遊行	46.9/53.1	28.7/71.3	23.008**
參與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	25.0/75.0	36.4/63.6	9.854*
向政治人物或公務人員表達意見	22.2/77.8	21.5/78.5	0.045
為活動募款或籌設基金	43.8/56.2	34.1/65.9	6.455
向媒體表達意見	16.2/83.8	16.6/83.4	0.16

*p<0.01, **p<0.001

表 9 及表 10 是 Olomouc 及 Presov 的公民組織參與及公民行動參與的相關性，檢視這二個實證表格的結果，可以再進一步說明這二個中東歐地方城市的公民參與情形。第一、整體觀察的結果，Olomouc 及 Presov 居民的公民組織參與及公民行動參與間的相關性都呈現弱相關；第二 Olomouc 的參與其他自願性社團(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及參與公民行動各項目的相關性皆達顯著水準，顯示 Olomouc 居民透過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來參加公民行動的相關事實。Presov 在其他自願性社團及公民行動間的相關性雖不如 Olomouc 強，但比起其政黨或運動休閒文化團體等項與公民行動的相關，相對而言也算是有較強的連結；其三、在 Olomouc 的個案中，參與政黨相對而言，也比較有可能參與公民行動，其次，參加工會、商業或職業同業工會也有部分可能會去參與公民行動。在 Presov 的個案中，參加工會、商業或職業工會的居民也比較有可能性參與一些公民行動，與 Olomouc 相反的是，Presov 的居民參加政黨比較不會去參與公民行動，除了向媒體表達意見一項。其四、在 Olomouc 參加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的人基本上不太會參與各項公民行動，而在 Presov 則有部分項目的相關性，不過 Presov 居民有高達 4 成 2 的居民有參加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但基本上似乎大部分的人不會透過這些組織而去參與太多公民行動。

綜合以上所述，透過中東歐地方社會的 Olomouc 及 Presov 之實證檢驗，有以下二點的評論：第一、像 Olomouc 及 Presov 這樣中東歐中等規模的地方城市，其公民參與的比例相對較高，這是否為個別現象，還是普遍情形，值得進一步研究？第二、透過 Olomouc 及 Presov 的公民參與比較，才能更具體深入地方公民社會的了解，同時也發現 Olomouc 及 Presov 的公民社會特色。我們相信每個地方或城市

的公民社會都有其各自的特色，本小節首先透過公民參與的情形來描述 Olomouc 及 Presov 這二座城市的公民社會特質，下文將繼續從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的實證研究來說明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的內涵。

表 9 Olomouc 政黨、公民組織與公民行動的相關性

	請願連署	抵制行動	示威遊行	捐款	向媒體表達意見
政黨	.038	.079	.150*	.114*	.188*
工會、商業或職業同業公會	.067	.058	.237**	.212**	.109
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	-.012	.042	.000	.000	.032
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	.086	.146*	.027	.060	-.026
其他自願性社團	.175*	.262**	.213**	.253**	.199**

*p<.05, **p<.001

表 10 Presov 政黨、公民組織與公民行動的相關性

	請願連署	抵制行動	示威遊行	捐款	向媒體表達意見
政黨	.028	.067	.047	.098	.290**
工會、商業或職業同業公會	.129*	.190*	.043	.232**	.095
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	.072	.064	.167*	.185*	.021
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	.087	.128*	.011	.020	.250**
其他自願性社團	.122*	.094	.094	.223**	.134*

*p<.05, **p<.001

(四)地方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

社會資本可指涉地方網絡相互支持系統，其中重要元素包括社會信任、政治信任、社會關懷及社會網絡連帶等變項。另外，社會資本亦指個人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源，比如說社會關係等。中東歐後共政權的地方社會發展備受關心的問題之一即為前政權的遺緒，一般認為共產政權的社會效果往往是政治或社會不信任、政治或社會的冷漠、政府貪污腐敗及人民普遍對政府深感無力感等。在鄭得興的博士論文研究中(Cheng, 2009)發現前述負面社會效果在後共時期仍明顯存在著，並且與西歐國家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這些負面要素在 Howard 的研究中被視為前共產政權的遺緒(Howard, 2003)。在西歐國家中，其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通常具有正面的相關性，在中東歐轉型的社會中，其公民參與或公民社會要克服的最大問題即在前政權所遺留下來的負面遺緒，因為正常來說一個冷漠的社會或無

信任感的社會，很難喚起人們對公共議題的關注或付諸行動以爭取改變社會的可能性。本研究發現捷克 Olomouc 居民對共產政權的懷舊比例並不高，這似乎表示他們揚棄了共產價值，然而斯洛伐克 Presov 居民對共產政權的懷舊比例仍稍微偏高，假如就對共產政權懷舊這點來檢驗 Olomouc 及 Presov 的社會資本差異性，是否意味著 Presov 居民的社會信任、政治信任或社會關懷程度都比 Olomouc 低呢？另外，根據前述的研究發現，Olomouc 及 Presov 的公民參與比例普遍皆高於中東歐整體水平，或甚至是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全國比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是否意味著地方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彼此間的關係具有正向連結，甚至可認為地方社會資本的增長促進了公民社會的發展。

本小節所指的社會資本為指涉社會整體的社會關係網絡、社會信任、政治信任及社會關懷等指標，並非個人可利用的社會資源，其中以張家銘教授(2010)的中東歐地方社會調查資料做為實證研究的基礎。本文首先從問卷題目選了五題做為分析社會資本的重要變項，分別是：(1)您認為在您城市中人們的互助關係好嗎？—親戚；(2)您認為在您城市中人們的互助關係好嗎？--鄰居；(3)您認為社會中的人們總可以被信任？(4)您認為政府人員所做的事都是對的？(5)您個人並不關心政治？前二題做為本研究中的社會關係網絡指標，後三題則做為社會關懷的指標，這二項指標合為本研究所指的整體社會資本。Olomouc 及 Presov 的比較研究結果呈現在表 11，表 12 至表 15 為 Olomouc 及 Presov 的社會資本與公民組織參與及公民行動參與的相關性。我們的研究重點有三：其一、對共產政權懷舊的差異性是否導致 Olomouc 及 Presov 的地方社會資本情況的不同 (表 11)？其二、本研究想了解地方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包括公民組織參與及公民行動參與)是否具有相關性 (表 12 至表 15)？其三、社會資本是否能做為地方公民參與的解釋變項 (表 16 及表 17)？

本研究以五個變項指稱社會資本，包括親戚關係、鄰里關係、社會信任、政治信任及政治關懷等，表 11 為 Olomouc 及 Presov 在這五個變項上的無母數差異

性檢定，其中只有鄰里關係有達顯著性的差異，其他四項的檢定在這二個地方並無顯著的差異，所以大致而言，Olomouc 及 Presov 在本研究中所指涉的社會資本比較上是差不多的情形。其中，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信任及政治信任的比例相當低，分別是 Olomouc 的 6.4% 及 Presov 的 2.4%。易言之，Olomouc 及 Presov 的居民對社會及政治仍抱持相當高比例的不信任態度。另外，具有政治關懷的居民比例雖然稍為高些，不過仍有二成多的居民抱持著政治冷漠。再者，以親戚關係及鄰里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網絡還算比較受居民的肯定。在社會信任與政治信任度極低的情況下，是否就意謂是前共產政權的遺緒持續作用在當下的社會發展，這點很難說，因為 Olomouc 的共產懷舊比例較低(11.6%同意，14.8%不置可否，73.6%不同意)，他們大多似乎已不再認同共產政權的本質，而懷舊可能只是目前社會快速變遷下的心理反應。在 Presov 的共產懷舊比例比較高(19.3%，31.1%不置可否，49.5%不同意)，基本上 1970 年代後的 30 年裡，其共產政權或民主化後的共產政權延續性的執政都對斯洛伐克的經濟發展有正面的貢獻，因此斯洛伐克的人們或許對共產政權的排斥性不同於捷克，但是否有此衍生出斯洛伐克人民比較習慣於共產政權下的不信任及冷漠，在此很難下結論。不過本研究所假設的 Olomouc 及 Presov 對共產懷舊的差異性似乎並未能支持二地社會資本具有顯著的不同。大致來說，Olomouc 及 Presov 的人際社會網絡具有地方特色，比起大都會的人際關係，應該算是比較親密些，但對社會及政治的信任及關懷程度顯然相當低。這樣的地方社會資本特色與公民參與是否具有相關性，本研究繼續加以檢驗。

表 11 社會資本之卡方檢定

	Olomouc +/0/- (%)	Presov +/0/- (%)	卡方差異檢定 Chi square value
親戚關係	65.3/25.6/9.1a	72.5/21.5/6.0	4.447
鄰里關係	48.8/41.0/10.2a	61.3/29.9/8.8	10.777*
社會信任	5.7/18.1/76.1b	3.3/22.1/74.6	3.454
政治信任	6.4/10.4/83.2b	2.4/9.7/87.9	6.395
政治關懷	23.7/34.0/42.2b	23.5/26.5/50.0	5.208

*p<0.01, **p<0.001

a:+:非常好或好, 0:不好不壞, -:非常壞或壞

b:+:非常同意, 0:無所謂, -: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

表 12 至表 15 是針對 Olomouc 及 Presov 二地受訪者進行社會資本變項與公民組織參與變項，以及社會資本變項與公民行動變項間的無母數相關性檢定。綜合結果來看，不管在 Olomouc 或 Presov，其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的相關性都相當低，即使有顯著相關的強度也頂多是二成多，大致呈現弱相關的情況。這樣的結果說明了地方的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的關係並不緊密，但再進一步比較的結果，可以發現 Olomouc 的政治關懷及政治信任與公民行動變項間的相關，儘管相關性仍不高，但仍顯示 Olomouc 居民的政治關懷及政治信任最終付諸於公民行動的意願是比 Presov 高些。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想像，姑且不論是否會成為烏托邦的理想境界，易言之，公民社會似乎應該是個高信任、高關懷及高參與的「文明」狀態，社會組成的每個份子對公共事務及議題的關心，並在某程度上信任透過協力分工的方式可以達成問題的解決，信任關係是合作的重要基礎，信任基礎低很難化解社會衝突。不過社會信任基礎低的現象部分原因是源自制度性的問題，假如放寬檢視，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仍屬轉型中的過渡社會處境，制度的漏洞形成的政府無能、貪污腐敗及擅權的情況仍持續存在，這些都影響著人們對社會及政府的信任度。或許中東歐地方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的相關性之間，仍須要加入若干中介變項或控制變項，比如說對政府的貪污腐敗及對政治的無力感等因素。在鄭得興的過去研究中（「中東歐的市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之比較研究」，2008 年及其博士論文研究“Civil Society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the Neo-Democracies: The Taiwan and Czech Cases”，2009）都證實了這些中介變項亦是中東歐社會轉型中的普遍心態。

以捷克 Olomouc 及斯洛伐克 Presov 所代表的某種中東歐地方的公民社會而言，我們綜合本研究上述所有實證的結果，暫時得出以下的看法：地方居民覺得整體生活變好了，對共產的懷舊也不那麼強烈了，地方社會的公民參與比例也高於全國平均，但為何地方社會的信任及關懷程度還那麼低？而在不那麼高的社會信任及關懷比例下的人們，似乎也不太願意參與公民社會的組織與行動。前共產政權的歷史遺緒是否仍持續作用於今日的社會生活，或許不太容易回答。本研究無法處理這個歷史遺緒的議題，這裡也只能點到為止，不過接著繼續分析是哪些人比較積極公民參與，或哪些要素影響公民參與是本研究的最後驗證。

表 12 Olomouc 社會資本與公民組織參與的相關性

	政黨	工會、商業 或職業同業 公會	教會或其 他宗教團 體	運動、休閒 或文化團 體	其他自願 性社團
親戚關係	.008	.090	-.019	.082	.097
鄰里關係	.115*	.065	.013	.050	-.023
社會信任	-.003	.097	-.027	.069	.102
政治信任	.100	.109*	.064	-.007	.156*
政治關懷	.202**	.088	.023	.014	.153*

*p<.05, **p<.001

表 13 Presov 社會資本與公民組織參與的相關性

	政黨	工會、商業 或職業同業 公會	教會或其 他宗教團 體	運動、休閒 或文化團 體	其他自願 性社團
親戚關係	-.010	.037	.090	.113*	-.061
鄰里關係	.032	.045	.089	.043	-.053
社會信任	-.032	.067	-.023	-.005	.041
政治信任	-.023	-.065	.025	.027	-.056
政治關懷	.037	.086	.049	.015	.164*

*p<.05, **p<.001

表 14 Olomouc 社會資本與公民行動的相關性

	請願連署	抵制行動	示威遊行	捐款	向媒體表 達意見
親戚關係	.030	.012	.032	.146*	.037
鄰里關係	-.014	-.014	-.068	-.013	-.005
社會信任	.001	.033	.123*	.086	.009
政治信任	.003	.114*	.118*	.112*	-.008
政治關懷	.140*	.119*	.193*	.261**	.137*

*p<.05, **p<.001

表 15 Presov 社會資本與公民行動的相關性

	請願連署	抵制行動	示威遊行	捐款	向媒體表 達意見
親戚關係	-.001	.013	.090	.046	.034
鄰里關係	.065	.046	.064	.016	-.015
社會信任	.033	-.006	.005	.060	.102
政治信任	.013	-.025	.094	.012	.144*
政治關懷	.091	.178*	.154*	.073	.056

*p<.05, **p<.001

本研究最後透過迴歸統計來處理有關公民組織及公民行動解釋變項的可能

性，表 16 是公民組織參與的邏輯迴歸，表 17 是公民行動的多元迴歸。本研究之所以要將公民組織與公民行動分開以二種統計迴歸處理方式，主要是因為本文對公民組織的研究興趣在於是否有參加任何公民組織，事實上我們的資料也顯示鮮少有人參加二種以上的公民組織，因此採取邏輯迴歸的統計方式。然而，本研究的地方公民行動列有七項，受訪者回答參與不同的公民行動是有可能的，因此本研究將公民行動設為連續性變項，分析各解釋變項的斜率變化如何影響結果變項，所以本研究利用多元迴歸來處理這項問題。在這二種統計迴歸模型中，本研究投入四類指標，分別是人口變項、生活及工作條件、社會資本及公民行動/公民組織參與，其中人口變項包括有性別、教育、社會階層及年齡等變項，生活及工作條件變項有二個：生活條件及貧富差距的看法，社會資本變項包括社會信任、政治信任及政治關懷，最後是以是否參與公民行動來解釋公民組織參與，而以是否參與公民組織來解釋公民行動。

表 16 公民組織參與之邏輯迴歸

	Olomouc		Presov	
	β	Exp(β)	β	Exp(β)
人口變項				
性別(女性)	.090	1.094	-.481	.618
教育(高中以下)	.314	1.369	.300	1.350
社會階層(下層)				
中層	.449	1.567	.002	1.002
上層	.386	1.471	.045	1.047
年齡	-.016*	.984	.009	1.009
生活及工作條件				
生活條件	-.044	.957	.286	1.331
貧富差距	.584*	1.787	-.093	.911
社會資本				
社會信任	-.528	.590	-.354	.702
政治信任	1.222*	3.393	-1.128	.324
政治關懷	.065	1.067	.206	1.228
公民行動	1.098**	2.999	1.379**	3.971
常數	-1.090	.336	-1.133*	.322
N	335		335	
R-Square	.107		.071	
Chi-Square	34.654***		21.760*	

*p<0.05, **p<0.01, ***<0.001

首先就表 16 的統計分析結果來看，影響 Olomouc 公民組織參與的變項，且達統計顯著的有年齡、貧富差距、政治信任及公民行動等變項，影響 Presov 公民

組織參與的變項達顯著的僅有公民行動。以年齡變項來看，在 Olomouc 的回歸模型中具有顯著水準，顯示年輕人比年長者稍微積極地參與公民組織，年輕人較無過去共產政權下的生活經驗，理應也較無前政權遺緒的影響，不同於 Presov 的情形，統計結果顯示 Presov 的年輕人比較不像 Olomouc，年長者還是比較有可能參與公民組織，不過，Presov 的年齡變項並未達顯著水準。其次是 Olomouc 的貧富差距變項有達顯著水準，認為貧富差距越大的受訪者越有可能參與公民組織。過去共產時代貧富差距不大，但在後共時期經濟發展下貧富差距逐漸拉大了距離，貧富差距越大引起人們對社會不正義的觀感越強，或許參加公民組織的可能性也越高。另外，政治信任的變項也是解釋 Olomouc 居民參加公民組織的重要原因，結果顯示政治信任越強的人，參與公民組織的可能性越高。在 Olomouc 的社會資本變項中，只有政治信任能有效解釋參與公民組織，Presov 的三個社會資本變項都未達顯著水準。最後，在 Olomouc 及 Presov 的共同情況是有過參加公民行動經驗的居民比較有可能性加入公民組織。

表 17 公民行動之多元迴歸

	Olomouc	Presov
	β	β
人口變項		
性別(女性)	.227	.235
教育(高中以下)	.494*	.582**
社會階層(下層)		
中層	.126	-.014
上層	.207	.137
年齡	.011	.035***
生活及工作條件		
生活條件	.291	.436*
貧富差距	.201	-.531**
社會資本		
社會信任	.292	.167
政治信任	.274	-.308
政治關懷	.954***	.447**
公民組織參與	.729***	1.73***
常數	.620	-.173
R-Square	.176	.295
F value	5.743**	10.741***

*p<0.05, **p<0.01, ***<0.001

最後再以同樣的自變項加上公民組織參與變項來檢驗 Olomouc 及 Presov 的公民行動參與，結果發現(表 17)在 Olomouc 的多元迴歸裡，達顯著水準的變項包括教育、政治關懷及公民組織參與，在 Presov 的多元迴歸裡，達顯著水準的變項包括教育、年齡、生活條件、貧富差距、政治關懷及公民組織參與。Presov 達顯著水準的變項多於 Olomouc，其迴歸係數(.295)高於 Olomouc(.176)。首先從 Olomouc 與 Presov 同樣都有達顯著水準的變項來說明，先以教育來看，在 Olomouc 及 Presov 的情況是相同的，亦即受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比高中以下教育程度者較有意願參加各項公民行動。其次，有政治關懷的居民也比較容易參與各項公民行動，Olomouc 及 Presov 在此變項的影響效果相對比其他變項大。最後，Olomouc 及 Presov 二地共同具有達顯著水準的變項為參與公民組織，透過公民組織的參與進而在參加各項公民行動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另外，在 Presov 的迴歸模型中有達顯著水準的其他變項尚包括年齡、生活條件及貧富差距等。就年齡而言，年長者仍是比年輕人參與公民行動的可能性要高，覺得整體生活條件變好的人比覺得變差的人更有可能參與公民行動，不過覺得貧富差距變大的人卻比較不會去參與公民行動。

綜合上述 Olomouc 及 Presov 迴歸模型的結果分析如下，第一、受過高等教育的居民比較願意參加公民組織及公民行動；第二、除了 Olomouc 的年輕人比年長者較願意加入公民組織外，其他如 Olomouc 的公民行動，及 Presov 的公民組織及公民行動都顯示年長者較年輕人更有可能參與；第三、Olomouc 及 Presov 的受訪者認為整體生活條件的感覺越好，越有可能加入公民行動；第四、Olomouc 的居民感覺貧富差距越大，越有可能加入公民組織，然而，Presov 的居民感覺貧富差距越大，越不可能加入公民行動的行列；第五、性別與社會階層變項的解釋能力皆不顯著；第六、除了 Olomouc 的政治信任能解釋加入公民組織的參與外，其他如 Olomouc 的社會信任及 Presov 的政治及社會信任都無法有效解釋公民參與；第七、政治關懷無法有效解釋 Olomouc 及 Presov 的公民組織參與，但卻能有效解釋二地的公民行動參與；第八、公民組織及公民行動參與的變項成為交互解釋公民行動及公民參與最有效的自變項，顯示加入公民組織或參與公民行動者，越有可

能同時去參與公民行動或加入公民組織。

六、結論

中東歐在民主化之後有回歸歐洲認同的路徑取向，因此本文首先以中東歐整體的公民參與情形與西歐比較，結果發現中東歐公民參與的平均水平仍與西歐有明顯差距。如同西歐地區內部國家間的公民參與具有差異情形，中東歐內部的公民參與亦具有明顯的變異情況，所以本文再由國家層次比較了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公民參與，以及更深入到地方城市探討最基層以及草根的公民社會。本文利用實證的資料，並從公民參與、生活環境及社會資本等面向分析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為何要從地方公民社會了解起呢？因為中東歐後共產國家目前仍處於民主鞏固階段，來自地方公民社會的草根性力量才是民主鞏固的基礎，而公民社會的歷史脈絡正是源自歐洲封建年代至今的地方城市發展過程。所以了解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的發展，不僅對中東歐民主化會有更深入的認識，也會更清楚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間的差異性，因為不會同時存在二個相同的「公民社會」。本文選取了二個中東歐中等規模人口的城市做為分析對象，分別是捷克的 Olomouc 及斯洛伐克的 Presov，理由是這二座城市的許多外在條件相似，但他們的公民社會內涵未必一致。本文利用張家銘教授主持的 2010 年國科會計畫，我們共同前往 Olomouc 及 Presov 進行田野調查，所蒐集回來的一手資料進行實證分析。除了問卷調查資料，我們另外進行了地方公民社會議題的深度訪談，但由於本文篇幅的限制，無法將訪談的質性資料一併納入分析探討。本研究主要採用公民參與做為地方「公民社會」實證分析的指標，而公民參與再分為二個指標層面，其一為公民組織的參與，其二為公民行動的參與。另外，再將社會資本與生活環境作為檢驗公民參與的相關指標進行分析，其分析結果在正文都有說明及討論，本結論部分將綜合正文的分析結果，整理成本研究的發現及論點陳述，之後再說明本研究的限制。

經過本研究的實證分析後，本文有以下幾點論述：其一、中東歐中等規模人口城市(約數萬至十數萬人口左右)具有相對較高的公民參與率，這是一國民主化及民主鞏固的重要基礎；其二、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發展差異性大，惟有了解各地方公民社會的歷史與文化背景，才能明白地方公民社會的特色；其三、中東歐地方社會對共產政權的懷舊似乎逐漸淡化，這對公民社會的發展有正面助益；其四、中東歐歷史的負面遺緒似乎對公民社會仍具某程度影響力，社會及政治的信任基礎仍相當薄弱；其五、中東歐後共產國家加入歐盟之後，地方居民整體感受到生活環境變好了，但貧富差距變大了，生活環境的變化影響地方居民對公民參與的意願；其六、中東歐地方受過高等教育者，其公民參與比率明顯較高，顯示教育因素的重要性；其七、一般而言，在中東歐地方居民隨著年齡增長，越有意願從事公民參與，但也有些地方顯示年輕人參與的意願高於年長者；其八、中東歐地方居民同時參與公民組織及公民行動的比例很高，顯示這二種公民參與的交互作用大。以上整體來看，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發展有其自身特色，各地方差異性大，本文特別選擇二座許多外在條件相似的地方城市作比較，卻發現他們公民社會/公民參與的許多差異點，這說明了後共時期的中東歐地方社會並非是一同質性社會。除非能夠理解中東歐地方社會的異質性與在地性，否則很難具體明白中東歐公民社會與民主鞏固的真實情況。

本文是實證研究的分析結果，所以結論所列出的研究發現及論述，都可以再次成為相關議題的研究假設或後續論證的可能。本研究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僅以中東歐二座城市為研究樣本，代表性恐怕不足。然而有個兩難的研究考量在於應該持續深化這二座城市的追蹤研究，還是應該開發更多中東歐地方社會的個案，以進行比較及歸納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的更多面向。二手資料無法取代我們實際田野調查的真實感受，不過在研究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是否應該在既有研究基礎/研究基地上強化後續的研究深度，是未來研究的重要考量，然而必須克服所為中東歐代表性的問題。儘管本研究不能推論整體中東歐地方公民社會

情形，但至少仍說明了部分。第二、研究工具的信效度問題。中東歐後共產社會的轉型是伴隨去共產化及建構新的現代性同時進行，減少對共產時期的懷舊及降低前共產政權遺緒的作用經常作為觀察後共產社會轉型的重要指標。不過在實證研究裡，往往很難釐清某種社會現象，例如社會信任及政治信任度低等，到底有多少比例是前政權遺緒，以及多少含量是現代性的社會冷漠所致。易言之，量化的研究指標必須要再經過不斷檢證，最終以求得最適度的研究工具。第三、比較性的問題。從實證研究的方法來檢視比較性的問題，首先可能會考量在同質性的基準點上比較差異性，以本研究為例，中東歐之所以與西歐比較是因為中東歐後共產國家民主化的路徑是像西歐轉向，為了能加入歐盟，中東歐國家必須轉型為西歐民主式的公民社會樣態。Olomouc 與 Presov 的比較基點在於曾為共同國家的歷史、中等城市規模、文化古城、大學城、遠離首都又兼具地方發展中心等許多相似的社會、歷史及文化背景。其實這種同質性的假設也必須冒某程度的危險，因為是否具有真正的「同質」性，就是一個問題，否則越來越異質化的中東歐地區，將來再作比較性的研究時，恐怕需要再多具有說服力的論證。Olomouc 與 Presov 是否為最適合做比較的二座城市，至少目前我們認為還算是，我們在 2011 年也做了台南的地方公民社會研究，我們希望透過跨文化的比較能得出更具有解釋性的論述，但比較性的問題還是主要的研究限制。因為這點缺乏說服性，比較的意義可能就不大。

附錄一 捷克及斯洛伐克之基本國情

	捷克(Czech Republic)	斯洛伐克(Slovak Republic)
簡史	1918 年獨立，與斯洛伐克共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二戰期間，捷克被納粹德國併吞，斯洛伐克獨立，但淪為德國附庸國。1948 年共產政權成立，1968 年布拉格之春遭華沙公約組織鎮壓，1989 年絲絨革命推翻共產政權，1993 年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2004 年捷克及斯洛伐克分別加入歐盟。	
國土面積	78,867 平方公里	49,035 平方公里
全國人口	10,177,300 (2012) 世界第 87	5,483,088 (2012)世界第 113
首都	布拉格(Prague)	布拉迪斯拉瓦(Bratislava)
首都人口	1162,00 (2009)	428,000 (2009)
族群	捷克人(波西米亞) 90.4% , 摩拉維亞人 3.7% , 斯洛伐克人 1.9% , 其他 4% (2001)	斯洛伐克人 85.8%, 匈牙利人 9.7%, 吉普賽人 1.7%, 魯森尼亞/烏克蘭人 1%, 其他 1.8% (2001)
宗教	羅馬天主教 26.8%, 新教 2.1%, 其他 3.3%, 無信仰 59% (2001)	羅馬天主教 68.9%, 新教 10.8%, 希臘天主教 4.1%, 其他 3.2%, 無宗教信仰 13% (2001)
政府型態	議會民主制(內閣制)	議會民主制(內閣制)
GDP(PPP)	\$272.2 billion (2011)世界第 46	\$126.9 billion(2011) 世界第 63
GDP per capita(PPP)	\$25,900 (2011) 世界第 52	\$23,400 (2011 est.)世界第 57
三級產業	農業 3.1%，工業 38.6%，服務業 58.3%(2011)	農業 3.8%，工業 35.5%，服務業 60.7%(2011)
失業率	8.5%(2011)	13.5%(2011)
出口物品	機械、運輸設備、原料、燃料、化學製品	機械與電器設備、運輸工具、賤金屬、化學及礦物、塑膠
出口國家	德國 31.7% , 斯洛伐克 8.7% , 波蘭 6.2% , 法國 5.5% , 英國 4.9% , 奧地利 4.7% , 義大利 4.5% (2010)	德國 20.1%, 捷克 14.8%, 波蘭 7.9%, 匈牙利 7.3%, 法國 7.2%, 奧地利 7.1%, 義大利 5.8% (2010)
進口物品	機械、運輸設備、原料、燃料、化學製品	機械與交通設備、礦物製品、運輸工具、賤金屬、化學製品、塑膠品
進口國家	德國 25.6%, 中國 11.9%, 波蘭 6.5%, 俄國 5.4%, 斯洛伐克 5.2% (2010)	捷克 18.9%, 德國 18.3%, 俄國 9.5%, 匈牙利 7.4%, 波蘭 5.6%, 南韓 5.1%, 奧地利 4.9%, 義大利 4.1% (2010)

資料來源：<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參考資料

- Curtin, M.D. (1999) Transparen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U Governance: A Role for Civil Society? *Cultural Values*, Vol. 3, No. 4, pp:445-471.
- Das. J. R. (2005) Putting Social Capital in its Place, *Capital and Class*.
- Dimitrova, A.et.,al (2004)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Limits, *Democratization*, Vol.11, No.5, pp:91-112.
- Edwards, M. (2004) *Civil Society*, Polity Press. Cambrige.
- Elstub, S. (2006) A double-edged sword: the increasing diversity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12, No. 3-4, pp:301-319.
- Fagan, A. (2005) Taking Stock of Civil-Society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Democratization*, Vol.12, No.4, pp:528-547.
- Forst, R. (2001) The Rule of Reasons, Three Model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Ratio Juris*, Vol. 14, No. 4, pp:345-378.
- Fukuyama, F. (2001)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2. No.1 pp: 7-20.
- Ghose, R. (2005) The Complexitie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rough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pace and Polity*, Vol.9, No.1, pp:61-75.
- Glenn, J. K. (2000) Civil Society Transformed: International Aid to New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nization*, Vol. 11, No.2, pp: 161-179.
- Goodhart, M. (2005)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oblem of global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 Vol.12, No.1, pp:1-21.
- Goodin. R. E. et, al.(2003) When Does Deliberation Begin? Internal reflection versus Public Discussion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 51,

pp:627-649.

Gutmann, A.et.al. (2002) Deliberative Democracy beyond Proces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10, No.2, pp: 153-174.

Halman, L. et.al.(2006)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Europe: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Portugu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5, No. 1, pp:65-90.

Hayrinen-Alestalo, M. (2001) Is Knowledge- Based Society a Relevant Strategy for Civil Society? *Current Sociology*, Vol.149, Issue 4, pp203-219

Hendriks, M.C. (2006) Integrated Deliberation: Reconciling Civil Society's Dual Role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 54, pp:486-508.

Heyse, T. (2006) Consensus and Power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quiry*, Vol. 49, No. 3, pp:265-289.

Howard, M. M. (2003)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 P. (1993)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Ignatieff, M.(1995) On Civil Society—Why Eastern Europe's Revolutions Could Succeed,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2, pp:128-136.

Kluver, J. D. (2004) Disguising Social Change: The Rol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s Protective Masks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 Vol. 26, Issue 3, pp:309-324

Korosenyi, A. (1994) Intellectuals and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pp:415-424.

Lovell, D. W. (1999) Nationalist,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ospects for Freedom in eastern Europ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45, No.1, pp:65-77.

McLaverty, P. (2002)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8,

No.4, pp:303-318.

McSweeney.D. and Tempest, C. (1993) 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Political Studies*, XLI, pp:408-419.

Myant, M. & Smith, S. (2006)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st-Communist Politics in

a Czech Region,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8, No.2, pp: 147-168

Norton, P. et., al. (2007) Post-Communist and Post-Soviet legislatures: Beyond

Transition, *The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Vol. 13, No. 1, pp:1-11.

Parkinson, J. (2003) Legitimacy Problems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 51, pp:180-196.

Peregudov. S.(2006) Civil Society as an Agent of Public Politics,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Vol.44, No.6, pp:50-66.

Pettit, P. (2001)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Discursive Dilemma, Social,

Political, and Legal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Issue* 11, pp: 269-299.

Petukhov, V.V. (2007) Civil Society and the Democracy of Participation, *Sociological*

Research, Vol.46, No.4, pp50-59

Rakusanova, P. (2006) Civil Society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Ryfe. M.D. (2005) Doe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ork? *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pp:49-71.

Sadurski, W. (2004) Accession's Democracy Dividend: The Impact of the EU

Enlargement upon Democracy in the New Member Stat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urope Law Journal*, Vol. 10, No.4,pp:371-401.

Seligman, A. B. (2002) Civil Society as Idea and Ideal,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Civil Society, edited by Chambers, S. and Kymlicka, 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13-33

Shulman, S. (2002) Challenge the Civic Ethnic and West/East Dichotomies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5, pp:554-585.

- Smolar, A. (2002) Civil Society after Communism,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ito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tasavage, D. (2007) Polarization and Publicity: Rethinking the Benefit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1, pp:59-72.
- Stolle, D. (2003) The Sources of Social Capital, *Generating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Hooghe, M and Stolle, D. New York: Palgrave, pp:19-42
- Tirtanadi, A. (2006) National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Good Society*, Vol. 15, No.2, pp:41-46.
- Tismaneanu, V. (2002) Discomforts of Victory: Democracy, Liberal Values and nationalism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pp: 81-100.
- Vesely, A. Mares, P. et.al. (2006) The National Debate on Social Capital. *Literature Review on Civil Society, Citizenship and Civil Participa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Head of the Author's Team: Potucek, M., Prague: CESES FSV UK
- Whitefield, S. (2002)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Post-Communist Politics, *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Vol.5, pp: 181-200.
- Wnuk-Lipinski, E. (2007) Vicissitudes of Ethnical Civil Socie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tudies in Christian Ethics*, Vol.20.1, pp:30-43
- Yong, H. (2001),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Communist Regimes, *Kyklos*, Vol.45, Issue 3, pp: 393-406.
- Ter-Hsing, Cheng, 2009, "Civil Society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the Neo-Democracies: The Taiwan and Czech Cases", Dissertation,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 鄭得興, 2008, 「中東歐的市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之比較研究」,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2008 年春季號